第 50 卷 第 4 期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Vol. 50, No. 4
2013 年 7 月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Jul. 2013

论清代词学中的“自批评”

欧 明 俊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州　350007)

摘　要:“自批评”相对于对其他作家作品的批评的“他批评”而言,是对自己和己作的批评。清代词学不同时期的“自批评”皆独具特色,变化轨迹明显可寻,流派特征十分突出。清代词学“自批评”有“自赞式”、“自谦式”、“反省式”等多种形式。“自批评”多是首次开创性的“元批评”,是词学“命名”,享有发明“专利”。不少“自批评”本真可信,可见清代词史及词学史“原生态”,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和地位。对历史“当事人”词人的“夫子自道”,我们应充分“体认”,给予起码的尊重。自批评“缺席”的词学史,是不全的词学史,有必要作学理上的深刻反思。

关键词:自批评;元批评;命名;原生态;体认

中图分类号:I 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3)04-0077-08

本文用狭义文学“批评”概念,“批评”是指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评论。一般论文学“批评”,多指“他批评”,批评者是“专业评论家”,而不是作者本人。“自批评”是对自己和己作的批评,与“专业评论家”以他人作品为对象的“他批评”以及两人或两人以上的相互或交互批评的“互批评”,构成三维关系。学界长期以来通行的基本上是单维度的批评,即重视“他批评”,轻视甚至忽视“自批评”、“互批评”。“自批评”应是整个古代文论研究的重要议题,极有学术价值,可开拓古代文论研究的新领域,完善体系。视角更新,必然带来学术创新。兹事体大,一篇小文不可能完全解决问题,因此,本文专论清代词学中的“自批评”,以当引玉之砖。清代是词学史的“集大成”时代,“自批评”是清代词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惜长期以来基本上被学界忽视。将词学批评史仅仅理解为“专业词论家”对词人词作的批评史,是对词人的不尊重,也是对词学史“原生态”的轻视。

一

“自批评”最早出现于诗、文理论中。词学史上现存最早的“自批评”,是中唐刘禹锡《忆江南》词原题:“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① 说明己作是依曲拍填词,可见词体“原生态”。宋代词人有不少“自批评”,晏几道《〈小山词〉自序》是词学史上较早的自成体系的“自批评”,概括交待了词作的创作背景、动机、感情基调、功用等。唐宋时,词人因观念上多卑视词体,词学批评不发达,词人“自批评”意识不强,故此方面材料相对较少,元、明两代也有一些“自批评”。

清代词学批评的“自觉”远胜过宋、元、明各代,不同时期的“自批评”皆有自己的特色。清初词学基本上承晚明云间词派绪余,崇尚香艳绮丽。龚鼎孳早年专学花间、柳永艳词,词作结集《绮忏》,自言忏悔,但仍欣赏绮语,表现出矛盾心态,可见清初盛行花间、柳词风气。纳兰性德自少即酷爱花间词,《与梁药亭书》自述:“仆少知操觚,即爱《花间》致语。以其言情入微,且音调铿锵,自然协律。”② 纳兰词正如花间词声情并茂。清

收稿日期:2012-12-24

作者简介:欧明俊,男,安徽五河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① 刘禹锡:《刘禹锡集》卷三十四,北京:中华书局 1990 年版,第 495 页。

② 纳兰性德:《通志堂集》卷十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532 页。

初,多数词人观念上仍卑视词体,故多“悔少作”,董以宁《蓉渡词话》云:“仆与程邨少时,笔墨颇滥,小词俱数千首。仆尤好作空中语,所刻《琴言》六卷,意欲焚之。”①这种“自谦式批评”发自内心,不仅仅是客套话。

阳羡词派领袖陈维崧生于明末,少值家门鼎盛,词亦受云间词派影响,学花间,多“旖旎语”;入清后,颠沛流离,词作“穷而后工”。《王西樵〈炊闻卮语〉序》中,陈维崧自谦自己为糊口而背井离乡,只是“愁”,还谈不上“穷”,故词未“工”,而友人王士禄(西樵山人)遭受人生困厄(王氏曾于康熙二年因事入狱),“所遇最穷”,所以“为词愈工”。② 词人过于自谦,其实,他的词是老而愈工。又《贺新郎》(一事然否乎)云:“一卷《乌丝》饶寄托,怪时人、只道填词手。说诗者,固哉叟。”③感叹时人没有真正了解自己词作寄托遥深,别有怀抱,仅看到《乌丝》词集风情旖旎的表面。词学界通行观点,清代,张惠言论词始倡“寄托”,开启了常州词派。实际上,陈维崧早已明确自称词作“饶寄托”。因观念上不重视词人“自批评”,清代词学观念演进史上这一“消息”便自然被忽视了。

浙西词派词尊南宋姜夔、张炎,意欲以姜、张醇雅救明以来尚《草堂》者浮艳浅俗之弊。朱彝尊自述词学宗尚,《水调歌头·送钮玉樵宰项城》云:“吾最爱姜、史,君亦厌辛、刘。”④又晚年作《解佩令·自题词集》云:“不师秦七,不师黄九,倚新声、玉田差近。”⑤词人如实表达的词学渊源,正是浙西词派的理论旗帜。约康熙十三年(1674),朱彝尊作《陈纬云〈红盐词〉序》云:“予糊口四方,多与筝人酒徒相狎,情见乎词。后之览者,且以为快意之作,而熟知短衣尘垢,栖栖北风雨雪之间,其羁愁潦倒,未有甚于今日者邪?”⑥自述词作特色,认为词体最宜于表现“羁愁潦倒”之情。朱氏身处新朝羁縻环境,心境悲凉,故发此论。《解佩令·自题词集》又云:“十年磨剑,五陵结客,把平生、涕泪都飘尽。老去填词,一半是、空中传恨。”⑦是其年轻时恢复之志和晚年心境的独白,可见词人词风的变化。钱裴仲《雨华盦词话》云:“余谈古人词,唯心折于张、姜两家而已。……本朝词家,我推樊榭。佳叶虽不多,而清高精炼,自是能手。”⑧可知其词归依雅正而为浙派嫡传。“吴中词派”特别重视音律,“自批评”多强调合律,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续编》卷五称戈载“所自负者,以为吾词能辨四声,能分宫调”。⑨ 曹楙坚《昙云阁词钞》自序云:“近取万氏《词律》,与吾友戈氏顺卿所著《词韵》稍事审定,存者十之二三而已。”⑩

浙西词派过分迷信姜、张,流于琐屑饾饤、空疏薄滑,缺乏真情实感。这样,张惠言开启的常州词派便应运而生。常州词派以儒家诗教“温柔敦厚”论词,重“意内而言外”,推尊词体,故作词态度严肃,谭献《〈箧中词〉序》云:“至于填词,仆少学焉,得本辄寻其所师,好其所未言,二十余年而后写定。”⑪谭氏对作词的虔诚态度是前人少有的。学派内部注重师承,嘉庆九年(1804),周济始从张惠言外甥董士锡(字晋卿)学词,嘉庆十七年(1812)作《〈词辨〉自序》云:“晋卿虽师二张,所作实出其上。予遂受法晋卿,已而造诣日以异,

---

① 朱崇才编纂:《词话丛编续编》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96 页。
② 陈维崧:《陈迦陵诗文词全集·陈迦陵文集》卷二,《四部丛刊初编》本。
③ 钱仲联选编:《清八大名家词集》,长沙:岳麓书社 1992 年版,第 354 页。
④ 钱仲联选编:《清八大名家词集》,第 435 页。
⑤ 钱仲联选编:《清八大名家词集》,第 438—439 页。
⑥ 朱彝尊:《曝书亭集》卷四十,《四部丛刊初编》本。
⑦ 钱仲联选编:《清八大名家词集》,第 438 页。
⑧ 唐圭璋:《词话丛编》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3011、3014 页。
⑨ 唐圭璋:《词话丛编》第四册,第 3558 页。
⑩ 曹楙坚:《昙云阁词钞》,清道光二十三年刻本,卷首。
⑪ 唐圭璋:《词话丛编》第四册,第 3988 页。

论说亦互相短长。”①可见词学师承及词人间相互影响。陈廷焯自评《蝶恋花》(采采芙蓉秋已暮):“天下后世,读我词者,皆当兴起无穷哀怨,且养无限忠厚也。”②又云:“余曾作《菩萨蛮》云……起二语嫌着力,余皆悲郁而和厚,有风人之遗意。”③词人十分自信,又能客观指出己作不足。忠厚和平、哀怨悲郁,皆为常州词派的论词宗旨,词人“自批评”正是其整体词学观的体现。

近代战乱频仍,民众多灾多难。词人用词体表现离乱苦难,用艺术语言,将残酷的现实生活化为美丽的忧伤,谱成哀婉的感伤曲,用血泪凝成风雅。这一时代特征,“自批评”中有明显体现,蒋春霖《淡黄柳》(寒枝病叶)词序云:“扬州兵后,平山诸园林皆成榛莽,为赋数词,以寄哀怨。诒园索稿,作此谢之,悲从中来,更不能已。”④自述词作哀怨悲伤主题。光绪二十四年(1898)秋,郑文焯作《过秦楼》,词序云:“遭世乱离,游情匪昔,感时属景,不自知其词之凄异也。”⑤指出己作感情基调和风格。⑥

上述可见,清代词学史演进的各个阶段皆有不少“自批评”,“自批评”变化轨迹明显可寻,流派特征十分突出,亦有个性色彩,独具理论价值,构成清代词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非常值得重视。

二

清代词学“自批评”的著述方式多为序跋、书札、词序等,词话中有不少“自批评”,亦散见于笔记、诗话等文字中。“论词诗”中极少“自批评”,“论词词”中有一些“自批评”。与“他批评”相较,“自批评”较为零散,缺乏系统性。

“自批评”涉及清代词学各个方面。评论词人自己,如自述个性、学词经历、词学渊源、词学观念,作词态度、动机与目的、过程,等等。项廷纪《〈忆云词乙稿〉自序》云:“余性疏慢,不能过自刻绳,但取文从字顺而止。”⑦对自己个性有清楚的认识。王国维说:“予于词,五代喜李后主、冯正中,而不喜《花间》。”⑧欣赏至情至性、以“血书”的李煜词,当然不喜多“代言”而缺少作者个人真实情感的花间词。不少“自批评”如实记述学词历程、词学渊源,况周颐《〈餐樱词〉自序》云:“余自壬申、癸酉间即学填词,所作多性灵语,有今日万不能道者,而尖艳之讥,在所不免。己丑薄游京师,与半塘共晨夕。半塘于词夙尚体格,于余词多所规诫,又以所刻宋元人词,属为斠雠,余自是得阅词学门径。所谓重、拙、大,所谓自然从追琢中出,积心领而神会之,而体格为之一变。半塘亟奖藉之,而其他无责焉。”⑨将自己学词经历、审美趣味、词风变化交待得清清楚楚。词人“自批评”说明作词动机与目的,或别有寄托,项廷纪《〈忆云词丁稿〉自序》云:“患难以来,人事有不可言者。……读书之暇,唯仿《花间》小令自遣而已。”⑩或表达有意创新、自立门户之意,郑燮《刘柳村册子》坦陈:“板桥貌寝,既不见重于时,又为忌者所阻,不得入试。愈愤怒,愈迫窘,愈敛厉,愈微细。遂作《渔父》一首,倍其调为双叠,亦自立门户之意也。”⑪这些“自批评”皆是词人自我表态、自我画像,多本真可信。

---

① 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附,唐圭璋:《词话丛编》第二册,第 1637 页。
② 陈廷焯著,屈兴国校注:《白雨斋词话足本校注》卷六,济南:齐鲁书社 1983 年版,第 504 页。
③ 陈廷焯著,屈兴国校注:《白雨斋词话足本校注》卷十,第 770 页。
④ 周梦庄:《水云楼词疏证》卷二,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1989 年版,第 71 页。
⑤ 郑文焯:《樵风乐府》,第 33 页,陈乃乾辑:《清名家词》第十卷,上海:上海书店 1982 年影印本。
⑥ 参见欧明俊《清词中的离乱书写》,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主办“行旅、离乱、贬谪与明清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1) 大会报告。
⑦ 项廷纪:《忆云词》卷首,第 1 页,陈乃乾辑:《清名家词》第八卷。
⑧ 王国维:《人间词话·附录》,唐圭璋:《词话丛编》第五册,第 4274 页。
⑨ 况周颐原著,孙克强辑考:《蕙风词话 广蕙风词话》,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443 页。
⑩ 项廷纪:《忆云词》卷首,第 2 页,陈乃乾辑:《清名家词》第八卷。
⑪ 郑燮:《郑板桥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89 页。

“自批评”更多的是自评词作,评主题、风格、语言、技法、声韵、格律等。李佳《左庵词话》卷下载,刘炳照自题《秋窗填词图》云:“一寸词肠,七分是血,三分是泪。”①点明词作主题,此类“自批评”甚多,例子不胜枚举。词人自评己作风格,董以宁《蓉渡词话》自评:“仆隽永不如阮亭,澹远不如金粟,精绮不如程邨,但神韵偶到,时或相似耳。”②有的自评己作语言特点和艺术技巧,项廷纪《〈忆云词丁稿〉自序》云:“当沈顿无憀之极,仅托之绮罗芗泽,以洩其思,盖辞婉而情伤矣。”③况周颐自评《竹马子·赋看竹》“刻画博徒心理,无微不至矣”。④ 清代词创作多“学者化”,严谨认真,讲究音律,故“自批评”多论声韵、格律。或强调己作“协律”,陈元鼎《〈鸳鸯宜福馆吹月词〉自序》云:“余少嗜倚声,偶有一二曲流播歌筵酒座之间,遂为词家所赏,谓能免于仇山村‘言顺律舛,律协言谬’之讥。”⑤当然,亦有词人任性随意,不重音律,叶申芗《天籁轩词谱·凡例》末云:“素不谙音律而酷好填词,自束发受书,即窃相摹拟。”⑥

上述可见,“自批评”为我们研究清代词人思想及创作变化,分析词作特色,评定其词史地位等,皆提供了第一手材料,既有理论价值,又有文献价值,确实不该轻视。

清词人“自批评”具有多方面的特色和价值,可做不同角度的分析评价。有些“自批评”只是单纯记叙性的陈述,客观指出词作特点,不做价值判断,是谓“客观性批评”。如风俗词,多为纪事,是“实录”,不大计较文字工拙、艺术高下。朱祖谋《瑞鹤仙》(车尘萝薜碍)序云:“漫书此解,或亦他日考坊巷者之一助焉。”⑦词人有保存文献意识,文廷式《贺新郎》(天末春将老)序云:“词虽不工,姑录存之,以志鸿爪。”⑧清词人“自批评”更多的是“主观性批评”。词人性格气质各异,有个人好恶、审美偏嗜,对己作进行价值高低评判。有些词人颇自信,喜自赏自夸,是谓“自赞式批评”,王国维《人间词话》卷下未刊手稿云:“词家多以景寓情。其专作情语而绝妙者,如牛峤……此等词古今曾不多见。余《乙稿》中颇于此方面有开拓之功。”⑨过于夸大自己词作成就,我们要谨慎看待。词人有时自拟古人,有意识与前人相比,余怀《浣溪沙·五十进酒词》四首并序自评“歌罢陶然径醉,绝似辛幼安唱‘千古江山’时也”。⑩ 这类“自批评”点出词作渊源,但有借古人抬高自己之嫌。词人亦多“自谦式批评”,沈谦《填词杂说》云:“余少时和唐宋词三百阕,独不敢次‘寻寻觅觅’一篇,恐为妇人所笑。”⑪坦率承认自己不足,自谦,却是实话。许多词人过分自我贬抑,可理解为场面话,“言不由衷”,此类“自批评”最为常见。谦虚,是传统美德,不张扬,不自夸,是许多人的习惯思维。这种“自批评”实际上是一种“礼仪式”言说,并非真实观点的自然表达,言者、闻者皆未必当真。因此,我们要透过表象看本质,不能停留于字面理解,应警惕“唯文本”迷信。无论是自赞还是自谦,皆带有明显的主观感情色彩,有时“情”与“理”合,是合理的评价,更多的时候,过褒或过贬,皆不合学理,我们皆需保留式理性接受。

---

① 唐圭璋:《词话丛编》第四册,第 3146 页。
② 朱崇才编纂:《词话丛编续编》一,第 96 页。
③ 项廷纪:《忆云词》卷首,第 2 页,陈乃乾辑:《清名家词》第八卷。
④ 况周颐著,孙克强辑考:《蕙风词话 广蕙风词话》,第 491 页。
⑤ 陈元鼎:《鸳鸯宜福馆吹月词》,清同治元年刻本,卷首。
⑥ 叶申芗:《天籁轩词谱》卷首,道光十四年《天籁轩五种》本。
⑦ 钱仲联选编:《清八大名家词集》,第 877 页。
⑧ 钱仲联选编:《清八大名家词集》,第 806 页。
⑨ 王国维撰,黄霖等导读:《人间词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0 页。
⑩ 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全清词编纂研究室编:《全清词·顺康卷》(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 2002 年版,第 1234 页。
⑪ 唐圭璋:《词话丛编》第一册,第 633 页。

三

清词人“自批评”并不总是如“自赞”或“自谦”那样简单分明,实际情形丰富而多彩,从中可见词人复杂变化的思想、心态和审美观念。词人常作“反省式自批评”,特别是中晚年后修正甚至否定自己早年的词体观。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自述:“吾十年来服膺白石,而以稼轩为外道,由今思之,可谓瞽人扪籥也。”①反思长期以来重白石词而轻稼轩词之偏颇。陈廷焯早期作词受浙西词派影响,袭姜、张之貌,光绪二年(1876)年 21 岁时结识庄棫,词学遂转向常州词派,说自己“自丙子年,与希祖先生遇后,旧作一概付丙,所存不过已卯后数十阕,大旨归于忠厚,不敢有背《风》、《骚》之旨。过此以往,精益求精,思欲鼓吹蒿庵,共成茗柯复古之志”。② 此段话是后人认识陈氏词学转向的最可靠依据。“反省式自批评”多严肃冷静,学理性较强。

词人一生中不同年龄阶段,随着身份地位、人生际遇、学识、审美趣味的变化,“自批评”会随之改变。有些“自批评”,通过对早期词作的否定,试图遮盖一些不利于自己声誉者,为自己辩解,自我开脱。词史上普遍存在“悔少作”现象,可称“后悔式自批评”,清代词人中不乏“悔少作”者。嘉庆八年(1803),郭麐《〈灵芬馆词〉自序》后悔“少喜为侧艳之辞”,表示“序而存之,自此以往,息心学道,以治幽忧之疾,其无作可也”。③ 后又作《〈忏余绮语〉自序》,“自恨结习之难除,悔过之不勇也”,④再次“悔少作”。“悔少作”内容不同,有的后悔“少作”不成熟,有的后悔早年词风淫靡绮艳,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五坦承:“余初为词,亦不免淫冶叫嚣之失。”⑤“悔少作”是实际显现的“自批评”,表明作者当时的观点,同时还隐含着意思相反的“自批评”:后悔、否定,说明曾经喜爱过、肯定过,只是这种“肯定式批评”,没有用文字形式表达出来。⑥ 与其他文体相比,清词人“悔少作”出现频率较高。

还有一些特殊形式的“自批评”。词人词集命名,不少隐含“自批评”,或自赞,或自谦,更多的是指出特色,突出主旨,如戈载《翠薇雅词》、郭麐《忏余绮语》、况周颐《存悔词》。不少词人在词选中选入己作,附骥名人,表面自谦,实为自我欣赏,自我推销,亦是一种“自赞式批评”。南宋黄昇《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卷十选录己词三十八首,是词人附骥名人始作俑者。清词人承明人习气,更多此举,邹祇谟与王士祯同辑《倚声初集》二十卷,大量录入己作,王士祯更是几乎罄其所有。一般论文学批评,仅看“显性”批评,上述几种“隐性”的“非理论形态”的“自批评”,独具理论价值,却一直被忽视,应给予必要的重视。

“自批评”与“他批评”有复杂的“关系”。有时,“自批评”是对自己词作的首次批评,是“元批评”。有时则相反,是对“他批评”的“回应”,是“衍生批评”,但换一角度看,作为词人对自己词作的首次批评,亦是一种“元批评”。纯粹的“自批评”是“直接自批评”,还有“间接自批评”。词人转述他人对自己词作的称赏喜爱,是间接的自我赞许,郑燮《刘柳村册子》云:“拙集诗词二种,都人士皆曰:‘诗不如词。’扬州人亦曰:‘词好于诗。’即我亦不敢辩也。”⑦“他批评”者没有正式“出场”,词人引述证明自己观点。引用他人之言,多正面褒扬肯定,极少引用讥贬否定者,势必“遮蔽”一些客观评价。“当世批评”中,不少讥贬否定式批评都没有记录下来,“遮蔽”了词学史部分真相。词人对“他批评”的“回应式批评”,可称

① 唐圭璋:《词话丛编》第二册,第 1634 页。
② 陈廷焯著,屈兴国校注:《白雨斋词话足本校注》卷六,第 496 页。
③ 施蛰存主编:《词籍序跋萃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569 页。
④ 施蛰存主编:《词籍序跋萃编》,第 571 页。
⑤ 唐圭璋:《词话丛编》第四册,第 3907—3908 页。
⑥ 参见欧明俊:《论词学史上的“元批评”》,《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二十九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29—230 页。
⑦ 郑燮:《郑板桥集》,第 188 页。

“反批评”。有被对方说服,认可“他批评”者,如蒋敦复《芬陀利室词话》卷二提及时人对自己的批评:“此君才气,非我辈所能企及,独倚声一门外汉耳。”词人虚心接受,“缘此绝不填词者十余年”。① 不接受“他批评”,是为“反驳式自批评”,徐 《词苑丛谈》卷五云:“阮亭尝戏谓彭十是艳情当家,骏孙辄怫然不受。”②“批评”不是批评家的“专利”,作者并非只是被动的批评对象,他有权利为自己辩护,应充分尊重词人自己的观点。有些词人对他人的批评,多自我辩解,甚至狡辩,属于非理性的情绪化表达,我们需慎重看待。“自批评”与“他批评”观点一致或不一致,是由“自批评”者和“他批评”者的关系决定的。有时两者一致,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六云:“丙戌之秋,余曾赋《丑奴儿慢》一篇,极郁极厚,有感而发也。”自负己作已达到最高境界。其外甥包荣翰评云:“有感而发,极郁极厚,白石、碧山,合而为一。”③因血缘因素,难免主观感情倾向,“他批评”者自然认同“自批评”者的自我赞誉,并进一步发挥。词人喜引用他人对自己的赞赏,自己表面上不做评论,实际上是借他言而自赞,况周颐《水龙吟》(声声只在街南)词序云:“己丑秋夜,赋角声《苏武慢》一阕,为半唐所击赏。”④因学缘、业缘因素或属于同一流派,同一“圈子”,交往密切,观念相近,故多赞美对方。词人引述“他批评”,即代表“自批评”,两者似二实一。有时,赞美式“他批评”只是客套话,词人引述只是“一厢情愿”,与“他批评”者并没有形成互动的“学术对话”关系。因此,这种借他人以自重的“自赞式批评”的局限性是明显的。“自批评”与“他批评”观点有时不一致,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六自评:“余旧作艳词,大半付丙,然如《菩萨蛮》十二章……虽属艳词,似仍不背于古。”包荣翰评云:“丽而有则,雅而不纤,合端己、正中为一手。”⑤作者自谦,论者偏爱。词人“自批评”,他人或认同或批评,角度不同,故评价各异。历史“当事人”的“自批评”和他人的评价往往差异很大甚至完全相反,我们要充分“体认”,将两者结合起来综合评价。

词学思想是历代词人和词学家的共同创造,许多思想是“层累”地造就的。应充分肯定词人“自批评”的原创价值,同时也应肯定所有针对“自批评”的“他批评”的价值。他人和后人对词人“自批评”沿袭或修正,对“自批评”不断争鸣,推动了批评对象的传播。一部词学史,一定程度上是“自批评”不断产生,“他批评”不断“反应”的历史。

四

“自批评”记录了词人思想变化及创作的真实细节。谭献《〈复堂词录〉序》云:“献十有五而学诗,二十二旅病会稽,乃始为词,未尝深观之也。……三十而后,审其流别,乃复得先正绪言以相启发。”⑥讲究源流正变,清代词学师承脉络由此可见一斑。⑦

“自批评”可见清代词史及词学史“原生态”。余怀《浣溪沙·五十进酒词》四首并序云:“作《浣溪沙》词,命红袖歌之。歌一阕,聊进一杯。歌罢陶然径醉。”⑧自我陶醉,神情毕现。陈维崧《念奴娇》(空江采石)序云:“顾梁汾雨泊蛟桥,填词见寄,得‘软绣迷香’二语,狂喜跳踉,失脚堕水。书来语我以故,不觉捧腹,词以调之,亦用朱希真韵。”⑨词人毫不掩饰得意之情。我们仿佛走进词人生活,走进历史“现场”。

---

① 唐圭璋:《词话丛编》第四册,第 3654 页。

② 徐 编著,王百里校笺:《词苑丛谈校笺》卷五,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68 页。

③ 陈廷焯著,屈兴国校注:《白雨斋词话足本校注》卷六,第 506 页。

④ 况周颐著,俞润生笺注:《蕙风词话·蕙风词笺注》,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2006 年版,第 665 页。

⑤ 陈廷焯著,屈兴国校注:《白雨斋词话足本校注》卷六,第 524、526 页。

⑥ 唐圭璋:《词话丛编》第四册,第 3987 页。

⑦ 参见欧明俊《近代词学师承论》,《上海大学学报》2007 年第 5 期。

⑧ 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全清词编纂研究室编:《全清词·顺康卷》第二册,第 1234 页。

⑨ 钱仲联选编:《清八大名家词集》,第 233 页。

有些词人结合具体词作“自批评”,提炼出具有理论深度和普遍意义的词学范畴。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续编》卷三引江顺诒《〈愿为明镜室词稿〉自序》云:“余性刚而词贵柔,余性直而词贵曲,余性拙而词贵巧,余性脱略而词贵缜密,余性质实而词贵清空,余性浅率而词贵蕴蓄,学词冀以移我性也。”①作者自陈个性气质与词作风格的关系,强调作词可移情。这类“自批评”富于理论色彩,学理性强,对清代词学理论建设有独特贡献,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可惜学界重视不够。

影响“自批评”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自批评”因人而异,如年龄因素影响词人“自批评”即非常明显。年轻气盛时,词人难免自傲自负,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即多处自夸己作,如卷六评《买陂塘》(最愁人)一阕云:“呜咽缠绵,几不知是血是泪,盖天地商声也。”②随着年龄的增长、地位的变化,词人也会自我反省,自我修正,光绪十七年(1891),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自序》云:“暇日寄意之作,附录一二,非敢抗美昔贤,存以自镜而已。”③态度明显谦逊许多。“自批评”因时因地而异,“公开自批评”多发表于公共场合,因此,多场面话、门面语,自谦成分较多;“私下自批评”多亲友间交流谈心时自然流露,多真实可靠,当然,亦有场面话。词人的身份、立场、态度与审美观念,言说对象的不同,具体的情境,等等,皆是“自批评”的影响因子。

“自批评”多是一时一地对具体词作而发,有特定的情境,只表明作者一时的观点,切勿轻易普泛化理解,过度阐释。有时只是一时即兴之言,尤其是“礼仪式”自谦,我们都不能随便当真。有的甚至与实际完全相反,真实观点恰恰在字面背后。姚斯《走向接受美学》说:“第一个读者的理解将在一代又一代的接受之链上被充实和丰富,一部作品的历史意义就是在这过程中得以确定,它的审美价值也是在这过程中得以证实。”④“第一个读者”,就是第一个批评者,他的观点即是“元批评”。词学“自批评”,词人是作者,同时也是读者,是第一读者,是评论者,且许多时候是最合格的评论者,绝不应该将词人与评论者分离甚至对立起来。“自批评”多是首次开创性的“元批评”,是词学“命名”,具原创价值,享有发明“专利”,应充分肯定“发明”者之功。有些具体的“自批评”被后人征引,重复接受,当作“元典”使用。不少“自批评”当时在“圈子”内有一定影响,具“时效”价值,但因肤浅片面、粗陋平庸,缺乏深度,后世影响有限,有的甚至只是一次性的“昙花一现”。“自批评”的价值评定,既要重其原创价值,又要看其实际影响,有些影响虽不大,但具有理论上的“潜价值”,仍值得我们用心发现“挖掘”。“自批评”推动和扩大词人词作影响,推动词人转向和创作风尚,甚至改变词史演进轨迹,改变词学史走向,影响广泛深远,对词学史做出独特贡献,应充分重视其创新价值,系统梳理,给予合理的历史定位。

应从正负两方面评价“自批评”。从正面看,清代词学“自批评”多创作背景介绍,是最原始的词学史料,极具文献价值和理论价值,后人据此得以走进历史“现场”,认清词史及词学史“原生态”。作者的创作甘苦,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特别是背景、主题介绍,词人的自述往往最本真可靠。俞樾《洞仙歌》词序云:“余素不善倚声,而次女绣孙颇好之,因亦时有所作,积久遂多,但于律未谙,謦牙不免,是所愧耳。”⑤词人有自知之明,直白指出己作不足,态度诚恳。后人的理解阐释,往往主观发挥,多“误读”和“附加”成分,有的虽具“片面的深刻”,但远离历史真实,给人“终隔一层”之感,有的甚至“肢解”作者,“曲解”原作。不少“自批评”严肃、理性、客观,是对自己的“定评”,可作为评价依据,王国维《人间词话》卷下未

① 唐圭璋:《词话丛编》第四册,第3532页。
② 陈廷焯著,屈兴国校注:《白雨斋词话足本校注》卷六,第503页。
③ 陈廷焯著,屈兴国校注:《白雨斋词话足本校注》卷首,第2页。
④ 姚斯等著,周宁等译:《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5页。
⑤ 俞樾:《春在堂词录》卷二,光绪九年重定《春在堂全书》本。

刊手稿云:“余填词不喜作长调,尤不喜用人韵,偶尔游戏,作《水龙吟》咏杨花,用质夫、东坡倡和韵,作《齐天乐》咏蟋蟀,用白石韵,皆有与晋代兴之意。余之所长殊不在是,世之君子宁以他词称我。”①如实认真陈述词学观念和词作特色,这种“自批评”最具学理性。“自批评”价值及影响虽有大小高低之分,但因是词人“夫子自道”,是“原创”,我们皆应重视。

从负面看,清代词学“自批评”也有天生的不足,数量上无法与“他批评”相比,极少有系统的专文,更无自成体系的专著。除少数词人如陈廷焯、况周颐、王国维,多数词人“自批评”意识不强,给词学史留下很多空白,难以弥补。质量上,“自批评”不如“他批评”有较完整的体系和理论深度,影响自然相对较小。“自批评”多偏重背景、主题介绍,艺术上多点到为止,没有展开论证,不够深入;多对单篇词作而发,往往仅论述某一方面,过于简略,不够全面;又多一时感悟,主观色彩强,学理性总体上不如“他批评”。词人自己评论自己,很难做到客观公正,不少观点准确度、可信度反而不如“他批评”。对“自批评”的理解、评价,不可完全“唯文本”,作者说出的未必是真实的,我们应保持足够的警惕。“自批评”往往两极思维,二元对立,过分自赞或自谦,极端化评价。优点与缺点常相伴而生,“自批评”的得与失,经验与教训,皆应认真总结。

“自批评”是整个清代词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他批评”各占清代词学“半壁江山”,只是“自批评”领域较窄,比重较小。我们应在清代词学整体中考察“自批评”,同时应重视其“个性”特色,切忌孤立评价。不少“他批评”是在“自批评”基础上展开的,是“衍生批评”,我们不自觉的错误是轻视甚至忽视“自批评”,而拔高“他批评”的价值,有的因不知有“自批评”存在,有的是观念上的问题。对历史“当事人”的自我评价,我们应具“了解之同情”,充分“体认”,给予起码的尊重。自批评“缺席”的词学史,是残缺、片面的词学史,有必要作学理上的深刻反思。

On the Self-evaluation in the *Ci*-poetry Criticism of the Qing Dynasty

Ou Mingjun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looks into self-evaluation as a significant yet long-neglected mode in the Ci-poetry criticism of the Qing Dynasty. The Ci-poetry critics who applied this mode used to have their own instead of other Ci-poets' works as the objects of their criticism. The features of their self-evaluative comments evolved with time passing by and varied from one school of criticism to another. Rhetorically speaking, the mode of criticism in question could be classified into a number of types, of which the important ones were the self-appreciatory, the self-depreciatory, and the self-reflexive. The nomenclature of the Ci-poetry criticism, to a large extent, was a pioneering meta-evaluation with its originality and creativity and enjoyed a “patent” for invention.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 mode of criticism in question was found only in the Ci-poetry criticism of the Qing Dynasty, this argues for the irreplaceable value and prestigious status that it ought to be accorded. It's of great necessity to show the full realization of and rudimentary respect towards the self-assessment by the participants of history. Without paying close attention to this unique mode of criticism, no historical account of the Ci-poetry criticism of the Qing Dynasty could claim to be appropriate. And it deserves deeper introspection in the aspect of scientific principle or law.

Key words: self-evaluation, meta-evaluation, nomenclature, originality, realization

(责任编辑 郑 园)

① 王国维撰,黄霖等导读:《人间词话》,第 18 页。